

献身中国革命的烈士汉斯·希伯

□ 宋 芳



在山东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里，竖立着一块由罗荣桓元帅题词的墓碑，上面写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这位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就是汉斯·希伯。

向往中国 心系中国革命

1897年，汉斯·希伯出生于奥匈帝国（现波兰）的克拉科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伯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被捕入狱。出狱后，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他向往中国，研究中国历史，关心中国革命。

1925年，希伯以记者的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深入民众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向世界报道中国工人阶级争取生存和解放的斗争。目睹了五卅惨案后，他对国民党政府极为失望。1926年12月，希伯来到广州，成为了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希伯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共行径，愤然离开中国。但在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经历中，他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实行“消极抵抗”政策，甚至围剿、打击抗日力量。希伯闻讯后非常气愤。第二年，他和妻子秋迪先后来到中国。希伯在美国的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呼吁立即组织美、中、苏、英、法联合战线，以遏制日本侵略。

深入根据地 宣传中共抗战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以后，希伯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抗



汉斯·希伯（左一）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心同中国人民一起，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了解真实的抗战情况，希伯不顾艰难险阻，多次到中共抗日根据地采访。1938年春，他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希伯在向毛泽东告别时表示，以后要为人民的革命和正义斗争多写一些有价值的作品。

1939年2月，希伯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见到了周恩来和叶挺。希伯在皖南新四军根据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取得胜利的希望，赞扬新四军在长三角游击队中严格执行纪律和牺牲精神，并将其写入《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中，发表在《美亚评论》上。1941年初，希伯得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成立的消息，便赴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见到了刘少奇、陈毅和粟裕等人。在苏北采访期间，希伯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写成了一部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战的功绩。

希伯一直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由于日本侵略者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山东敌后战场的情况难以为人知晓。为了让世界人民听到那里的抗日声音，希伯提出要山东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敌后的活动。组织上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劝他暂时不要去。希伯却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没有外国记者去过，更需要我。”在希伯的坚持

下，组织派了一支新四军队伍护送希伯赴山东采访报道。在途中，希伯发现百姓们不论贫富，对新四军的士兵都是热情而慷慨的，并且拒绝向他们收取行军过程中的任何费用。希伯在他的文章《重访新四军根据地》中写道：“除了新四军以外，没有哪支军队能得到如此程度的信任、赞扬和爱戴。”

手握枪杆 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1941年9月，希伯在沿途新四军、八路军和老百姓的掩护下，顺利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来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当时山东正面临日军的残酷进攻，用笔杆子抗击日本侵略者已经不能完全抒发他的满腔热血，希伯毅然加入山东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领导决定从滨海区挺进沂蒙山区，与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会合，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反“扫荡”领导机构，希伯随军转移。

1941年11月初，日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开始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为了确保希伯的安全，党组织决定派遣一个精干的武装小分队，护送希伯冲出包围圈，取道苏北新四军根据地，返回上海。但是，希伯坚决反对，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抗击侵略者，我要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既来了，就不走。”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and 反法西斯的雄心壮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

□ 张连银 齐龙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仍由东段、中段、西段组成。从长安起始，经过陇右、河西、玉门关、阳关的路段为东段，从玉门关阳关至葱岭为中段，越过葱岭向西各条路线为西段。

丝绸之路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东段有洛阳、长安、平城、郿城等多个起点，从每个起点出发行至凉州，形成了不同的路线。其中，陇右道是主干线。陇右道最大的变化是南道与北道间尚有中道，此道从长安至陇县，而后西行经陇关或大震关越陇山，西北经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平襄（甘肃至渭西）到金城（兰州），过黄河至河西走廊。丝路东段南道和北道仍利用最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丝绸之路要道的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形势动荡，但诸政权对河西通道的经营和治理没有中断，河西走廊干线则变化不大，仍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除河西走廊的主干线之外，还有吐谷浑路、居延路和草原路。

丝绸之路中段即所谓西域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西交通和交流的发展，西域道继续被利用，但西域道从两汉时期的两道增加为三道或四道，多出了“北新道”和“新道”，即从敦煌至车师（今吐鲁番市西交河城）的一条支线和从车师后王庭（新疆吉木萨尔县南山中）西行，经天山北麓诸王国的草原路，西入乌孙、康居等的路线。公元3世纪，一条新的东西交通线“北新道”开通。“北新道”从敦煌、玉门关沿天山北麓西行，经巴里坤、古城、吉木萨尔、玛纳斯到达伊犁。由于有了“北新道”，

“北新道”西域至康居段路线比之前的北道更靠北，汉代“北道”便改称为“中道”。“中道”自敦煌、玉门关西行，经楼兰道与汉代北道汇合。“中道”的变化在于更多地利用了“新道”。“新道”是指从玉门关西北行至高昌、转西与“中道”在龟兹汇合，从而连接中道的支线。伊吾路自敦煌或晋昌（今瓜州县）经伊吾（哈密）至车师（吐鲁番西北），西行与西域北道或草原路连接。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亚地区是中国与南亚、西亚和东罗马交通的中转地。越葱岭西行的道路从汉代以来就分为两条。南道从于阗出发，越葱岭西行有三条路线进入中亚、南亚；北道经疏勒越葱岭出入西域，根据不同走向分别至南亚、西亚或西北行至拜占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间陆路交通几经盛衰起伏，但丝路交通仍继续发展。魏晋时，中原政权陆路交通的西部地区没有越过中亚。经过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北魏时期，中西交通出现了新局面。北魏通过与西域各国建交，才逐渐与南亚印度、西亚波斯和地西亚东欧的拜占庭建立起陆上联系。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中国通过陆上丝路交通的西部世界，首先是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又由近而远，扩大到南亚、西亚和东欧。

丝绸之路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上动荡纷纭，北方长期混乱，民族迁徙频繁，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依旧。

三国时期，来自中亚西域的商贾始终活跃于丝路沿线。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等地成为西域胡商的集散地。当时西域商贾一部分赴洛

阳，直接与王室宫廷贸易；另一部分商贾在敦煌销售货物后便西返。早在4世纪初以前，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已经通过西域道进入河西走廊，许多粟特人定居在河西走廊，从事商贸活动。尤其是五凉时期，河西走廊的粟特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把西方的罗马、波斯、中亚、西域与中国的商业贸易串联起来。粟特商人以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从事中转贸易，商队携带金银、麻制品、毛毡等纺织品，前往洛阳、金城、敦煌各地从事贸易活动，购入丝绸、麝香、樟脑等商品。

西晋、十六国时期西域胡商不仅活跃于北方丝绸之路沿线一带，承担河西至长安、洛阳甚至南方的互市业务，而且逐渐向南方扩展。南朝时期的萧齐政权、萧梁政权与西域诸国政治交往密切，贡使往来频繁，也使得西域胡商往来于吴蜀之间。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河西走廊的敦煌作为丝路要道和进入中原地区的门户，是西域商贾进入河西走廊重要的集散地。凉州亦是河西走廊另一个重要的贾胡及商贸中转地。粟特商人不仅活跃在河西走廊的敦煌、凉州、酒泉、金城等地，而且足迹还远至南阳、郿城等地。粟特人主要向中国内地销售麻纺织品、毛毡、胡粉、胡椒等，在中国购买麝香、丝绸等物。

北魏与西域的贸易主要采取贡使和互市两种形式。北魏与西域诸国的贡使贸易十分频繁，从北魏立国始至迁都洛阳止，河西诸政权和西域诸国先后100多次遣使到平城朝贡。迁都平城之后，西域诸国及波斯、大秦等又先后遣使至洛阳，西域使者进贡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和奇物，如大马、名驼、珍宝，还有汗血马、驯象、牦牛、宝剑等。北魏回赐“缯锦锦罽”。

希伯随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在师特务营的掩护下，转移到留田村时，突遭日军围剿。鉴于危急形势，一一五师决定向南突围，直指敌人大本营临沐附近，迫使敌人仓促回师，以此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夜晚，八路军在罗荣桓的亲自率领下，从留田东南的铁山子附近向南插去。希伯和战士们一起，一手提着枪支，一手紧握手榴弹，直奔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张庄，从敌人的火网缺口中冲出去。希伯在这次突围战斗中目睹了抗日战士行动敏捷、军纪严明的战斗作风。他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不顾疲劳，立即为一一五师的《战士报》写了一篇题为《无声的战斗》的通讯。文中写道：“八路军战士是那样的神速勇猛，以致使日军的巡逻兵在刚要喊叫和射击的一刹那，就被消灭了。只有共产党军队的将军和士兵能有这样的英勇和机智，才能这样团结一心。”

八路军的“留田突围”刺激了日军更加疯狂的“扫荡”，1941年11月29日，日军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将我部机关团团围困。当时我部只有一个特殊任务连和一些抗大学员，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激烈。为了掩护机关转移，部队首长决定将所有人员组成三个分队，分批向南突围。希伯谢绝随第一、第二分队先走，毅然拔出手枪加入最后突围的第三分队。敌人密集的炮火，将突破口封锁了。希伯的翻译和警卫员为了掩护他先后英勇牺牲了。希伯看着倒在身边的中国战友，无比悲痛。他拿过牺牲同志遗留下的武器，向敌人猛烈射击。然而最终，他还是没能抵挡住敌人的枪林弹雨，倒在了血泊中，年仅44岁。

中国共产党事业和精神深深吸引了希伯，他对中国共产党人由衷地敬佩。在强大力量的感召下，希伯选择了留在中国，为中国革命奔走呼号，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引起了他们对敌后抗日军民的极大关注。他们中有许多人民因此同情中国、敬佩中国共产党，远道而来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

北魏与西域诸族的贸易沿袭魏晋以来的传统，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和陇西的丝路沿线商业都市，如敦煌、酒泉、张掖、武威、陇西等。凉州州治姑臧是北魏与西域诸国互通有无的互市镇。西域商贾把西方的珠宝、织物、服饰、乐器等带来交换，同时把中国的丝绸、茶叶贩运至西域。突厥控制了漠北与西域后，大批西域胡商通过“朝贡”形式与北周、北齐贸易。

除了商业贸易活动，粟特人因政治原因东来，通过陇右东去关中，西通河西、青海，南下蜀中，北达宁夏，他们在水、陇西、兰州、河州、成州、西平、郿州等地形成聚落。粟特人及其后裔或定居或经行，或贸易或任官，甚至形成军事武装聚落，也形成了陇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逐渐交融于当地族群之中。凉州一带粟特人比较集中，不少粟特胡人参与前凉、后凉的政治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内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大量中亚僧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内地在洛阳、长安、凉州、敦煌翻译佛经，他们的译经活动推动了大小乘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化。此外，袄教随着粟特人的东来传入西域、河西走廊、内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逐渐本土化。粟特的音乐、舞蹈如旋舞、胡腾舞以及柘枝舞随着粟特人的东来传入内地。

总之，3—6世纪，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因分裂格局而停滞。丝绸之路东段、中段均有路线开拓就是这一时期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繁荣的反映。



公元10世纪初开始，中华大地上开始了一段大分裂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在此期间，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其中以吴越国统治时间最长，治下经济也最繁荣。吴越偏居东南一隅，或有与中原抗衡之势。然而，吴越国王钱俶却主动向大宋纳土归服，“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将所部13州、86县和1军悉数献给大宋。钱王归宋，保护吴越百姓免遭灭顶之灾，是一次影响深远的义举。

一

吴越国由钱俶的祖父钱镠创建，建都临安，其疆域包括今天的浙江、上海全境，江苏自镇江以东地区及福建东北地区。自唐末天下大乱以来，战火连天，生灵涂炭，临安钱镠为保护家乡，便组织义军，占两浙之地，号封吴越王。

当时，窃据四方的割据势力，有的名义尊奉中原，暗地里却图谋独立；有的则包藏祸心，企图扩张势力、侵扰中原。只有吴越钱王一脉，始终坚持“尊王一统”“善事中国”的正统思想。他始终把中原王朝视为至高无上的正统君主，把自己的吴越国看作是中原王朝治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翘首北望，期盼着中原局势一旦稳定，自己便率民回归。直至临终之际，盼归如渴的钱镠给子孙留下遗愿：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

此后吴越四代国王皆尊此祖训，一边向中原称臣纳贡，从经济上支持中原的发展；一边等待中原政局稳定，并默默地做好了纳土回归的准备。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接续正朔，迅速开启了统一天下的步伐。974年，宋太宗灭南唐，南唐北接中原，南邻吴越，在宋唐对战中，吴越国的态度至关重要。为争取吴越国，南唐李煜亲笔致书钱俶：“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以王权富贵拉拢钱俶。钱俶不为所动，以统一大义为重，以个人权位为轻，不仅没有出兵援救南唐，反而遣遣大宋旨令，派出精锐，夹击南唐，为天下一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二

平定南唐之后，宋太祖邀请钱俶进京。钱俶心里早就抱定了回归中原的主意，欣然率领妻子孙氏、儿子钱惟濬等亲族入宋，并献上厚重的贡品。宋太祖以殊礼相待，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并赐号钱俶之妻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宋朝官员反对，认为异姓诸侯王之妻不可获得“妃”的封号，宋太祖执意赐号，并说：“行自我朝，表异恩也。”

在文武百官的劝阻声中，宋太祖深信钱王的一片赤诚真心，毅然决定送钱俶回国。临行之前，太祖回赠吴越国大量重礼，并密赐钱俶一个黄锦匣，令他待离京30日后，屏退左右，开匣密观。钱俶依令开匣一看，密密麻麻，都是宋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章。他顿时泪流满面，始知太祖信任之坚、情谊之厚，从此归服之心益切。

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第二次入宋朝觐，见大宋文治武功，臻于鼎盛，铁桶江山，固若金汤。他深知天下统一的大势已定、回归中原的良机已来。陌上花开，或可缓缓而归；然投靠明主，岂岂容再待时日？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祖宗的遗愿，他毅然放弃吴越王位，将锦绣山川和兵甲将士，全部进献给宋朝，实现了和平回归。

吴越的和平回归，既是民族的大义，也是历史的必然。吴越与北宋，同文同种，同是



□ 邓田田

一个民族，本就是一家人。从钱镠开始，吴越三代五王，一直奉中原为正统，就是盼望着平稳回归那一天。吴越归宋，不存在民族问题，避免了同室操戈的惨剧，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由于和平回归，吴越军民无一人死伤，百姓安居乐业，朝野上下一片欢喜。

三

由于和平回归，一座历史名城——杭州进入了长达千年的历史兴盛期。在隋代以前，当时名为钱塘的杭州只是一个山村小县。至隋代，“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至唐代时杭州逐渐发展成东南名城，但其繁华程度始终远逊于金陵。五代时，由于数代钱王的苦心经营，杭州已繁华似锦，别具风采。

钱王在政治上坚持“善事中国”，为支持中原水运，推动贸易发展，他将杭州打造成一座花园锦簇的名城。至大宋统一天下之际，金陵由于南唐的负隅顽抗而倍遭浩劫，扬州、洛阳等地也因割据势力的争权夺位而残破不堪，只有杭州，不仅免遭战火，而且入宋以后在钱粮赋税、取才录士等方面都始终得到了特殊优待，“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羌管弄晴，菱歌泛夜”，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第一州”。

对于钱王归宋，宋太宗也深念其功，因此中誓于山河，发誓永保钱氏子孙富贵。钱俶本人获得空前的礼遇，随钱王入京的3000余名钱氏亲族，宋太宗让他们自择其官，不少人出任节度使、观察使、尚书、将军，甚至当上宰相，被授予官职者上千人，不愿任职工作的也都获得厚赏。钱俶子孙多人成为“尚公主”的驸马，越、钱二族通婚不断。

由于钱王归宋的大义之举，中华儿女避免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惨剧，两浙百姓免遭战火之苦。直到今天，当我们翻开形成于宋初的《百家姓》，朗朗上口的依然是“赵钱孙李”，“钱”能位列姓氏之第二，显现的是百姓对钱王大功的感激之情。千百年来，钱氏家族福泽深厚，长盛不衰，辈出英才，如近现代的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钟书、钱穆等等。岁月始终不负仁者！

